

英国保守党

[英] T·F·林赛 著
迈克尔·哈林顿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 国 保 守 党

1918—1970 年

〔英〕 T·F·林赛 著
迈克尔·哈林顿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 F.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1974

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74 年版译出

英 国 保 守 党

1918—1970 年

〔英〕 T·F·林赛 著
迈克尔·哈林顿 著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字数 197,000

1979 年 9 月第 1 版 197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9,000

书号: 3188·17 定价: 0.82 元

引 言

关于英国保守党，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它是一个联盟。它既不是一个单一阶级的政党，也不代表一种单一的激动人心的政治思想。保守党内确实有种种右翼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任何人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前后连贯的思想体系来说明英国保守党的所作所为，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也许有一个时期，可以把保守党人或托利党人说成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虽然那种讲法未免有点过于简单化。但是，自从工业革命在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开始发生影响以来，保守党实际上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党。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英国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是从埃德蒙·伯克的时代开始出现的。他的才智出众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而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政治哲学，尽管简略地研究一下也好。不过，就政治实践来说，罗伯特·皮尔爵士是现代第一位公认的领袖。在1835年的塔姆沃思宣言中，他接受了1832年的改革法，并保证他自己和他的同僚执行一种谨慎的改革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保守党”一词是这时候开始通用的。当然，“托利党”一词被继续沿用，而且由于它在报纸的大字标题上用起来很方便，所以至今仍被广泛地使用着。

皮尔的党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保守党十分相似；而利物浦勋爵的党则不然。其区别主要在于他们对正在形成的工业社会的各自的态度。利物浦勋爵和他的前辈，无论在不同场合曾表现得多么“反动”或者“自由”，基本上是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的产物。地主阶级的利益、英格兰教会、君主政体的地位——这些是他们特别关心的事情。对于工业，他们一点不了解，更谈不上关心。与此相反，皮尔的党，特别是1841—1846年的内阁，却关心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种种问题。皮尔政府之被人们怀念，主要是由于它对自由贸易所采取的行动和大量的工厂立法。1846年，农业保护关税废除了。其直接近因是爱尔兰发生了一场饥荒，但根本原因是英国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平衡起了变化。谷物法的废除是完成自由贸易结构的最后一个要素；总的说来，英国在1932年以前，一直奉行自由贸易。但是，事情远不止此。地主阶级利益的特权地位，即乡村对城镇在政治上所占的优势，被打破了。这是十九世纪英国发生的主要事情之一。很难想象，利物浦勋爵会考虑到那样的事情，而皮尔却把它完成了，虽然是在辉格党人的支持下完成的。没有什么比这能更清楚地说明老托利党人和新保守党人之间的区别了。

然而，如果认为老托利党和新保守党之间存在着一明显的分界线，即在某一时间，一个政党死亡了，而另一个政党在前者的废墟上诞生，那就错了。别的方面且不谈，至少在政治方面，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死亡之后还有生命。在

迪斯雷利反对谷物法案中鲜明地表达出来的那种托利党传统，继续对保守党和国家产生着影响。

最初，托利党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迪斯雷利把各郡的保护主义者结成一伙，使党发生分裂。结果，在 1874 年以前，他们未能以明显的议会多数再次执政。在这些年里，迪斯雷利所取得的成就，是接过从过去封建时代继承下来的老托利主义，把它改头换面，使之成为与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相适应的政治信条；而在 1867 年之后，这种信条对日益得势的民主制度是具有吸引力的。其结果同迪斯雷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大肆抨击过的皮尔保守主义有些相似。但是，迪斯雷利获得了党的支持，而皮尔却没有。

那么，“托利主义”和“保守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彼此又如何区别呢？人们早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托利主义的社会准则和信念扎根于封建传统。托利主义主张等级制度、权力主义和家长式统治。最重要的是托利主义主张集体主义。赫伯特·斯宾塞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新托利主义”，这不是毫无理由的。

托利党是教会和国王的党，这种对教会和君主政体的地位的特别关心，依然是保守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们既害怕罗马天主教，又害怕英国新教，把它们看作是对英国国教的威胁。他们认为，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宗教团体符合基督教信仰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需要。

托利党人保卫国王的王权和特权，不许被辉格党人操纵的国会来侵犯。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死抱住王权神

授的陈旧观念，而且还因为他们主张要有一个有力而果断的政府。按照托利党的宪法观点，国王是能力和领导所不可或缺的源泉。托利党主要关心的是秩序，并且，除了按照等级制度，他们想象不出有什么秩序可言。在都铎王朝和更早的时代，等级制度是求助于所谓宇宙的自然秩序来为之辩护，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太阳统治着一个从最大的木星到最小的、飞速运行的水星行星家族。每个星球上的生命，从简单的有机体逐步进化，直到它的顶峰——人类。这就是比尔教授所说的等级制度的“宇宙学论点”。自然界中如此明显地表明的东西，对人类社会无疑也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当埃德蒙·伯克捍卫辉格党的政治观念，从而奠定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时，他所依靠的是比尔所说的“社会学论点”。这一论点主要是诉诸经验和实践认识。例如，只有世袭的君主政体才能在我们的制度和特权的延续中确保世袭的权利和义务。他宣称，只有摆脱了日常劳碌的重担，并从孩提时候起就接受当领导人训练的贵族，才能为国家组织有效的政府。因此，从根本上讲，等级制度是正确的，因为它行之有效。在这样诉诸经验时，伯克弹起了现代保守主义的典型调子。

托利主义主张集体主义。强调个人消费者主权的自由市场思想，是同托利主义的全部主张截然相反的。对托利党来说，十分明显，应当使各种经济力量自行适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模式。如果这意味着干预“市场力量”，那

也只能这样。确实，在十八世纪后期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开始流行以前，为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办法的价值和利润作用过程的概念，对英国公共生活中的每个人说来，似乎是模糊不清、难以置信的。甚至时至今日，对许多政治家说来，情况依然如故。

保守主义和托利主义不同，它没有真正的目标。在托利党人的演说和著作中，人们还能看到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尽管它是多么模糊和多么不全面。为什么那些仍然宁愿把他们自己称为托利党人而不愿称为保守党人的人们，会觉得做个激进派那么容易呢？也许原因就在于此。政治上的空想作风在某些方面同他们是气味相投的。这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尤其如此。当时，迪斯雷利和约翰·曼纳斯勋爵以及“青年英格兰”运动的其他一些人，出于反对自由贸易和工业主义，描绘了一幅封建乐土的图象，而统治这块封建乐土的是品格高尚的、父亲般的、一心为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贵族。

通过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可以最好地探讨保守党人对政治的看法；他的《随想集》是英语著作中对空想政治抨击得最激烈和最有说服力的一本书。他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不是出于善良的意愿，那么至少在抽象原则上，空想政治铺平了通向地狱的道路。在伯克看来，稳健的政治家的才能需要懂得和了解民族传统和各个历史社会的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和成见。他不能容忍那些试图用理智来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害怕让人们根据他个人所拥有的理智去生活和经营；因为我们猜想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理智是很少的，而一个人如能利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所拥有的全部理智，那就会干得更好一些。我们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不是去破除一般的成见，而是要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发掘他们当中普遍存在的潜在智慧。如果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他们常常如愿以偿），他们就认为，坚持包含着理智的成见，比起抛开成见的外衣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理智来，是更为明智的；因为，成见连同它的理智，在根据理智采取行动时，具有一种推动力和使这种推动力持之以恆的感情。成见在紧急情况下随时可用；它保证思想预先沿着一条智慧和美德的坚定道路前进，使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不致犹豫不决，疑虑重重，左右为难，打不定主意。成见使一个人的美德成为他的习惯，而不只是一系列互不关联的行为。通过合理的成见，人的职责成为他的性格的一部分。

这段引文包含着伯克思想的精华，理智是一种脆弱的、靠不住的指导，而成见体现了世代累积下来的智慧。伯克的其他一些独特的格言，如果不是直接由此而来，那么至少也与此有关。例如，他强调谨慎和温和是首要的政治美德。在他看来，这些原则或态度导致发展、稳定和自由。

当然，对于另一些持不同看法的人，伯克认为：

……同他们谈论那种宪法形式的实践是徒劳的，尽管其优点已经过经验的严格考验，并为日益增长的公众力量和国家繁荣所证实。他们把经验鄙视为不学无术之辈的智慧；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好比在开发地下矿藏，要在一次大爆炸中给我们带来所有的老古董以及议会的所有先例、宪章和法令。他们坚持“人权”。对于这些人权，不能有什么规定，也没有什么必须同意的论据。人权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凡是不列入他们全部要求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过是欺诈和不义。任何政府要是违反他们的人权，那么它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能否有正义和公正的治理，都是得不到保障的。

这不应当理解为，伯克认为人是没有权利的。恰恰相反，他非常关心体现在社会的法律、风俗和制度中的种种历史的、具体的权利。但是，在抽象的“人权”的名义下，把现存的一切一扫而光，使他充满恐惧和反感。在他看来，这必然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恐怖和暴政。在1790年，他预料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于法国。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由于相信法国只是在试图模仿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认为伯克是歇斯底里的和荒唐可笑的。但是，当他的预言开始成为现实——国王和王后被杀害，恐怖统治一切——时，伯克在历史上的声誉就确立无疑了。

然而，把伯克仅仅看作一个聪明的、雄辩的而又有先见

之明的反动派，那就错了。他是十九世纪支配英国政治的那种牌号的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王位很尊重，但是，当国王乔治三世力图改变权力平衡，使之有利于国王而有损于国会时，他就以下院和人民的名义加以反对。

在威尔克斯事件上，伯克论证：这是政治上的王权使约翰·威尔克斯这样一个合法当选的下院议员被剥夺了席位。他还争辩说，英王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表明，一个政治家想博得人民而不是国王的好感，那将是危险的。他抨击了关于政府的地位和职能的下列看法：“下院并不象近来有人根据一种有最恶毒倾向的学说所告诫的那样，它不是为了控制人民而设置的……而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实行控制。”

虽然保守党在政治上被认为同英帝国的事业是一致的，但保守主义在思想上的创始人却把他的大部分政治生命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要求同美洲殖民地和解而不是战争。尽管英国政府有合法的权利去扑灭一场叛乱，但比较好的办法是劝导他们取得协议，而不是依靠武力来寻求解决：“我所考虑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有权使你的人民受苦，而在于你是否愿为他们造福。这不是一位律师告诉我可以做什么；而是人道、理智和正义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在伯克对沃伦·黑斯廷斯进行的长期而毫无结果的弹劾中，他试图指出，英王陛下的印度臣民有权反抗海盗般的帝国缔造者们的掠夺。伯克的许多主张现在都已过时。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相信宗教是社会的基础。也不会有人

认真地提出，没有财产的人不准享有政治权利。温和、谨慎、小心、尊重经验和先例以及不信任“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谋略家”，都是相当普通的品德，而且总的说来，已有点令人厌烦了。伯克使这些世俗的美德变得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他把英国的政治传统浓缩成一种有条有理的哲学，不用抽象的名词而是根据实际政治情况具体地表达出来。

伯克的哲学和托利党的传统之间，显然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对财产、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信仰，形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共同基础。伯克的保守主义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自由主义、它的哲学深度和它的政治方法论。因为，伯克同老的托利党人不同，在政治方面掌握一种思想方法。尽管他所熟悉的那个社会已经消失，这种思想方法却还是中肯合用的。

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而使保守党发生分裂之后，看来皮尔的保守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托利主义又东山再起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尽管迪斯雷利和浪漫主义的托利党人多少抱有这种愿望，1832年以前的局面已不可能恢复了。英格兰已是一个工业社会。保守党人要末正视这个新社会所产生的问题和所关心的事情，要末就只能在政治上销声匿迹，不受重视。1846年和1867年之间，后一种情况看来很可能就是保守党的命运。他们好象注定要下院里充当永久的少数派，只有当他们的强大对手陷于四分五裂，以致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议会多数时，才偶尔短暂地当一下政。

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成功，是由于他竭力使保守党对

商业和工业阶级具有吸引力。由于托利党人顽固地反对议会改革，他们曾把这些因素作为一份政治礼物送给了辉格党人。但是，皮尔谨慎的温和作风，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辉格党政府的改革热情合在一起，导致了一次重大的重新组合。如果保守党不是在谷物法问题上自作自受的话，皮尔的联合政府很可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统治政治舞台。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1846年以后保守党的政策又一次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它是个乡村的政党。这样一个政治基础实在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在议会里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数。

在保守党作为反对党的几十年间，迪斯雷利成了保守党的领袖。正如罗伯特·布莱克（现在是勋爵）所着重指出的那样，迪斯雷利是这个时期保守党唯一天才的议会雄辩家，以致即使党内不信任他，却还是少不了他。在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有声有色的冒险家中，迪斯雷利的政治发迹最为引人注目。他是个毫不掩饰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犹太人（在种族上，而不是在宗教信仰上），是几本畅销小说的作者，是个知识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然而他却成了因循守旧的、缺乏想象力的英国地主阶级的政治领袖。他们是他们当中最不象会当保守党领袖的人。然而，他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更有办法，找到了使保守党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获得选举胜利的公式，那就是：民族主义加社会改革。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辉格党一皮尔

派一激进派的优势看来是如此稳固，除非力量平衡发生根本的改变，否则保守党人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种改变随着 1867 年的改革法到来了，这一改革法给城市工人阶级中的重要部分以选举权。这项法案由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少有的而且是短命的一届保守党政府所通过。在保守党的神话里，这一步骤曾被吹捧为“托利党民主”起作用的典范。实际上，鼓舞迪斯雷利使这项法案在下院获得通过的原因，仅仅是希望提出一项他知道得很清楚是势在必行的改革来打击辉格党一自由党人。他也许曾希望，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们会出于感激而投保守党的票。如果是这样，他就失望了，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但是，在改革法案上的斗争，确实加强了迪斯雷利对保守党的控制。这一次保守党人有了一种胜利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可能是虚构的。格莱斯顿受到了挫折并被对方所智胜。德比勋爵引退之后，迪斯雷利当上了首相和保守党的领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到达了滑杆的顶点”。这根杆子确实是很滑的。在 1868 年的大选中，当时以它的传统形式出现的自由党在下院赢得了巨大的多数，因而格莱斯顿组成了他的第一任政府。城镇新兴的工人阶级选民也许认识到，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才是真正支持改革法案的政治力量。

虽然迪斯雷利和他的许多同行不同，也许凭直觉就看出了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的真正力量，1867 年的改革法并没有被看成是建立保守党的地主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而采

取的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行动。它是有人授意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企图做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至少那些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来沽名钓誉。虽然1868年的选举是一次失败，却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环境，保守党人终于开始摆脱1846年遗留下来的灾难。

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1868年和1874年之间发生的政治进程同1832年和1841年之间发生的相类似。格莱斯顿政府出于它的改革热情，抨击了英国的某些根本制度。回顾起来，虽然他们的许多改革，特别在陆军和文官制度方面，似乎是温和的，并且是早该实行的，但格莱斯顿的辞令在有产阶级看来却是偏激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几十年里，工商界人士基本上都是自由党人，因为他们的利益在许多方面是同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的，而地主阶级的利益构成了保守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但是，当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加强自由党内的激进分子的地位时，有产者——工业、商业和地主阶级——开始在保守党内联合起来。在迪斯雷利的鼓动下，保守党人放弃了保护贸易政策，而且迪斯雷利的温和作风使他能够实行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三十年前实行过的相同的政治策略。人们可以说，正是在1868年到1874年这个时期，保守党开始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政党扮演它的时代角色，尽管它仍然由那些本质上还是满脑子前资本主义观点的地主贵族领导着。

然而，如果它只代表有产者的利益而不及其余，那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政党了。正是在这点上，迪斯雷利

本人的性格发生了影响。在他早期写的一些小说里，特别是在《西比尔》和《科宁斯比》两本小说中，迪斯雷利对贫困和肮脏十分关心，他猜想这些都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他论证说，英国的天然统治者地主贵族的职责是，关心那些被信奉曼彻斯特学派的放任主义学说的辉格党—自由党工厂主们所忽视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正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所谓“托利党思想”。

但是，当迪斯雷利在1874年再度出任首相时，他对社会改革却没有什么积极的兴趣了。他的内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才是这方面真正出谋划策和贡献精力的人。几项有名的措施被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对两代人来说始终是这方面的一项基本法律。手工艺人住宅法使地方当局第一次能设法着手处理工业城镇中恶劣的居住条件——这个艰巨的问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问题是保守党人已做得够多了，足以使他们能令人信服地自诩为一个致力于人道主义社会改革的政党。当迪斯雷利暮年还担任首相时，他由于被复杂的对外政策问题所困扰，自己对社会改革没有表现出什么积极的兴趣，但无疑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他那种神话式的榜样，鼓舞后来托利党的社会改革家努力奋斗，并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托利党的传统在继续发生影响，对正在出现的工业社会不再是打一场后卫战，而是援引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准则使工业化的过程人道主义化，或许还阻碍这一过程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一点也不值得称道

的。但是，这比毫无作为要好些。在物质福利方面，所有工人对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迪斯雷利公式里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和中期，殖民地通常被认为是国家的负担，它们或迟或早——而且宁可早些——会从母国分离出去，象美国人干过的那样。然而，在十九世纪后期，基调开始发生变化。首先，英国出口方面不受限制的扩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告终。美国 and 欧洲的主要大国都对英国商品筑起了关税壁垒。这样做并未能有效地抵制英国商品。实际上，在1914年，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实行高关税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工业最好的海外主顾。但是，它们确实使英国出口增长率逐步下降。其次，当别的国家都工业化了，英国越来越觉得，它那些最先进的产品不再拥有垄断地位。在工业生产方面，德国和美国先是赶了上来，随后超过了英国。在许多新兴工业中，诸如化学工业和电器工业制品等，英国一开始就落在后面。在世界市场上，英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感觉到了竞争的凛冽寒风。

因此，工业很自然地应该开始重视殖民地市场。确实，在那些处于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中，自由贸易占支配地位。但是，即使没有保护关税，英国产品在英国领地上也明显地占着便宜。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还是英国经济负担的殖民地，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中，成为日益重要的市场了。